

新编

中国民间宗教辞典

濮文起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新编

中国民间宗教辞典

濮文起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中国民间宗教辞典/濮文起主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211-06978-1

I. ①新… II. ①濮… III. ①民间宗教—中国—词典 IV. ①B93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9868 号

新编中国民间宗教辞典

XINBIAN ZHONGGUO MINJIAN ZONGJIAO CIDIAN

主 编: 濮文起

责任编辑: 郑 炜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州市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 邮政编码: 350008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64.75

字 数: 218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978-1

定 价: 38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濮文起

—

在传统中国的信仰版图中，如果说儒、释、道是三座耸立的山峰，承载着这三教^①的是厚重的民间信仰的话^②，那么，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则是生生不息的民间宗教。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民间宗教信仰的汪洋大海。^③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帝崇拜等。但是，作为一种成熟的民间宗教，即包括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宗教教规、宗教组织诸要素^④的民间宗教，则始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继五斗米道、太平道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大乘教、弥勒教；宋朝初年，由摩尼教演变的明教，以及元朝末年问世的白莲教，都是民间宗教中的引领潮流者；特别是明中叶无为教的崛起，在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无为教为蓝本的各种名目的民间宗教教派，如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以及它们的分支派系龙华教、龙天道、大乘天真圆顿教、长生教等相继产生，并因此形成了一场空前的民间宗教信仰运动，而明末由学术团体演变的三一教，更使民间宗教信仰世界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清代是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最为繁盛的历史时期。首先，明代中末叶产生的无为教、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三一教等教派都基本上流传下来，并采取新的方式与手段，加快了传播进程，因而拥有更为广泛的信众。其次，涌现一大批新的教派，如清初出现的天地门教、八卦教、张保大大乘教、在理教、张进斗龙华会、老官斋教等教派；清中叶出现的清水教、义和拳教、收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天理教、五盘教、白阳教等教派；到了清末，又出现了青莲教、先天道、灯花教、真空道、末后一着教、九宫道和由学术

① 这里所说的儒教，“非指儒学或儒家之整体，而是指殷周以来绵延三千年的中国原生宗教，即以天帝信仰为核心，包括‘上帝’观念、‘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制度，以儒生为社会中坚，以儒学中相关内容为理论表现的那么一种宗教体系”（何光沪：《中国文化的根与花》，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309页）。

② 卢云峰、李丁：《台湾地区宗教的格局、现状及发展趋势》，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6页。

③ 参见赵嘉珠主编《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该部史料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单位，将19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版的方志中的“会道门”史料辑录起来，并绘制了各地“会道门”分布图。如果将全国各地“会道门”分布图拼成全国“会道门”分布图，那么，人们就会立即看到各种名目的“会道门”就像汪洋大海一般，布满全国大地。

④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团体转化的黄崖教和刘门教，以及借用基督教某些教义建立的上帝教等教派。这些教派均是清代民间宗教世界颇具影响的大教派，至于由这些教派衍生的各种名目的支派就更多了，约有百余种。这些新老教派分布于大江南北，盛行于长城内外，因而造就了一个比明代更为庞大且充满活力的民间宗教信仰世界，掀起了一场比明代更为波澜壮阔的民间宗教信仰运动。^①

步入民国以后，不仅明清时期出现的民间宗教大多数教派继续以迅猛的气势向前发展，而且还出现了大量冠以“会”或“社”名目的民间宗教新兴教派，如同善社、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道德学社、世界红卍字会以及教派武装红枪会等教派。这些新兴教派与历史传承下来老牌教派相互激荡，竞相发展，因而构成了一个更加光怪陆离的民间宗教信仰世界。

近两千年的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雄辩地证明：与世界上所有宗教一样，民间宗教也是人类掌握世界、认识人生的一种方式。因此，民间宗教无论是作为宗教组织，还是作为文化形态，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客观存在，如果历史无视它的存在，那么，中国历史、中国宗教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就没有真实的全面的记载。

二

在传统中国的信仰世界里，民间宗教比儒、释、道三教更具包容性、持续性、开放性、适应性。探寻民间宗教的特殊品质，可以使人们明确民间宗教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从中洞悉民间宗教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巨大作用与深远影响。

（一）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人所共知的，其典型表现就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和儒、释、道的相互融会与相互补充。但是，在士人社会和三教上层的观念里，三者虽奥旨相通，但毕竟还有各自的形态和地盘，并且事实上也有主辅之分。所谓“主”者，儒家思想耳。即使是主观上厌弃儒家入世取向的方外老僧、隐逸高道，也绝不能从根本上反对儒家为全社会制定的

^① 清代民间宗教的繁盛，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宫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中的“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该档案内容起自雍正初年，止于宣统年间，被清政府查禁的教派有一百二十多种，即白莲教、洪濛教、一字教、姚门教、老官斋教、龙华会、荣华会、太阳经教、圆顿教、九莲教、三阳教、在理教、先天教、无为教、罗教、大乘教、三乘教、清茶门教、清净门教、幅军（幅教）、号军、悄悄会、红羊会、红阳会、一炷香教、如意教、圣贤教、义和门教、八卦教、乾卦教、离卦教、震卦教、坎卦教、艮卦教、明天教、五盘教、八卦紫金会、金丹八卦教、清水教、天真门、燃灯教、天龙八卦教、牛八教、添柱教、太平教、红杨教、天门教、矢公教、达摩教、佛门教、明灵教、无极门教、青莲教、黄阳教、收圆教、顺天教、鸿钧教、音乐会、天真门、罗祖教、龙门教、白门教、天门教、儒门教、圆顿教、黄天教、一碗水教、白莲池、文贤教、圣贤教、红灯教、红莲教、红教、白阳九宫教、摸摸教、未来真教、斋教、青教、青阳教、新新教、混元教、糍粑会、敬空老祖会、三元会、九莲会、把子会、白阳教、长生会、长生教、红黑会、白衣教、金丹道、邱莘教、如意道教、老人会、牛八教、虎尾教、九宫教、老佛教、看香学好教、红黄白会、末后一着教、灯花教、清水教、武圣教、天理教、老理会、阴盘阳盘教、新安教、金兰教、皈依无为教、黑莲教、如来教、火官会、弥勒教、祖师教、天乙会、神拳教、弥陀教、清灵教、一字教、道心教、桥梁会等。其中，有些教派是一教多名，或多教一名。尽管上述统计并不准确，但仍能客观地反映清代民间宗教已成为困扰清政府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行为准则；更有许多人在视儒家修齐治平、经世致用主张和伦理道德规范为天经地义的同时，出入佛老，也是多少带有鉴赏、玩味的心态。^①

只有民间宗教才将儒、释、道看作一个整体，并将三教作了最为和谐的处理。在民间宗教中，儒家的道德信条，佛教的果报思想，道教的修炼方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真正的“三教合一”。不仅如此，民间宗教还容纳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资料，它不排斥任何神明，而是让各路神明汇聚一堂，任凭下层民众根据各自需要，进行自由地选择，且有意识地强化、扩大神明的特殊功能，从而形成既源于民间信仰，又高于民间信仰的谱系化神明结构，如民间宗教创造的女神——无生老母以及经过民间宗教改造的改天换地之佛——弥勒佛，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由于无生老母的横空出世，民间宗教便以这位女神为最高崇拜，构建了一套以弥勒佛与龙华三会信仰为核心的宗教理论。^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通过儒、释、道三教，而且也通过民间宗教展示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品格。

（二）持续性

作为正统宗教的儒、释、道三教，一直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们高高在上，为封建专制国家的长治久安殚精竭虑，特别是佛、道二教，曾在封建专制统治者极力扶持的盛唐与两宋时期，出现过宗派云蒸霞蔚的繁盛场面。但是，随着佛教、道教日益脱离下层民众和其内部的逐渐异化，自明中叶始，盛唐时期出现的佛教八大宗派，只有南禅与净土二宗流传，道教也只是全真、正一两派勉强支撑门面。

只有民间宗教能在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不断清剿、严酷镇压的恶劣形势下，以其根植于普罗大众肥沃土壤之中的古朴、本真精神，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民间或公开或秘密地流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间宗教并没有因为教派的兴替，而使其整体上的宗教思想中断，反而薪火相传，保持了持续性。翻开明清民间宗教发展史，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各种名目的教派，一个时期，如秋风落叶，一个时期，又如雨后春笋，总是处在不断的生成变化进程中。连接新老教派之间的纽带，不是别的什么“法宝”，而是以“宝卷”等经卷形式作为载体的民间宗教思想。对此，清朝乾隆帝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欲防止“邪教”孳生蔓延，加强保甲，仍属于皮毛，只有搜缴“邪经”，销毁“邪教”思想，才是万全之策。为此，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专门颁发了一道谕旨，训导各省官员，务必尽心竭力，搜缴邪经、伪讖。^③但是，乾隆帝是徒劳的，“宝卷”等各种形式的民间宗教经卷，犹如野火春风，一直在乡土社会流传。

① 张新鹰：《台湾“新兴民间宗教”存在意义片论》，《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秋季号。

② 民间宗教思想体系约形成于明末清初。这种宗教理论可以概括为：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以弥勒佛与龙华三会信仰为核心，强调入教避劫，重视内丹修炼方术，按照九宫八卦建立组织，以及通过十八子实现太平盛世——云城降世。濮文起：《弓长论》，《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4期。

③ 《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七十一，乾隆十一年七月癸亥上谕：“妖书伪讖，实为煽惑之端，被惑之人，所在多有，应定以限期，将一切图像妖言，赴地方官自首，立即焚毁，免其究治。如逾期不首，仍有私立教堂，诱人附和，广集匪党，以吃斋诵经为名，希图生事者，立拿严究，不得仍前姑息，以酿成悖逆之罪。今虽部议严行保甲，但为治之道，宜端其本，稽察保甲，犹属末节。”

（三）开放性

进入清代以后，无论是儒、释、道三教，还是民间宗教，都面临着是继续发展，还是迅速衰退的历史命运。有清一代，佛、道二教的教职人员虽然数目尚有不少，但因清廷废除了历代由官府控制通过考试批准出家人的制度，遂使大批无文化、无真信仰的流民和贫困破落者涌入僧道队伍，借佛道谋食，遂使僧尼道士的宗教素质和社会地位日益低下。在清末一部记述京华风物的书中，作者竟将僧尼道士女冠与蚤虱蚊蝇等并列为人间“十害”，反映了社会人士对僧、道二教的反感和厌恶。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大炮开路，强行输入基督教信仰，而信奉上帝，视佛道为魔鬼的上帝教，兵锋所至，无庙不焚，遂使江南佛、道几遭全面覆灭。^① 康梁戊戌变法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上奏清廷，主张“废庙兴学”。清廷采纳了这位封疆大吏的建言，于是各地占夺寺院庙产风波四起。

与此不同，民间宗教却在清代获得了空前发展，其发展势头一直持续到整个民国时期，并吸收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宗教思想，在其宗教思想中倡导儒、释、道、耶、回“五教合一”，乃至“万教合一”，表现出比儒、释、道三教更具开放性。

（四）适应性

与儒、释、道三教不同，民间宗教自问世时，就命运多舛。为了能够生存和发展，民间宗教养成了能够适应任何社会制度的特殊性格。如在理教自清初建立以来，便主张戒食烟酒，鸦片战争以后，又力主戒食鸦片，并为此制成戒烟药膏，免费发放，使许多戒毒者受益，因而被晚清政府允准公开传教。清初产生的天地门教，以心理疗法或派功叩头等手段，为下层民众治病，分文不取，被称为“穷人的宗教”。因此，清当局也没有对其严厉查禁。1947年，天地门教流行的河北沧州一带，已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于是天地门教便在其《请圣经》中，写进“共产主义普延全世界”的祝词。步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活跃于福建莆田、仙游一带的三一教，更是以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向当地政府声张自己的法律诉求，^② 表达了一种企羨跻身正统宗教，与佛教、道教等五大宗教比肩而坐的政治愿景。

三

中国民间宗教具有强烈的“挽劫救世”的社会关怀，主要体现在“救己、救人、救世”三位一体的宗教思想与宗教实践。正因为民间宗教具有这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力图使下层民众脱离苦难的一系列行动，遂使其成为下层民众趋之若鹜的信仰集合体。

“救己”。“创立宗教的人，必须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③。民间宗教大多数教派的创立者，都是因为人生苦痛，心灵无依而学佛、学道，经过一番修炼、

^①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② 2006年，福建三一教以“三一教协会”名义，在福建省莆田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成为合法民间组织。

^③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

感悟而后才创立教派的。如明中叶无为教创立者罗清家境贫寒，世代隶属军籍。他幼小失怙，跟随叔婶长大。十四岁时，代叔从军，戍守北直密云卫。成化六年（1470），他开始参师访友，寻求了脱生死、悟道明心之路。经过十多年的“苦功悟道”，于成化十八年（1482）创立了无为教。又如黄天道创立者李宾，青年时代，在家务农。嘉靖九年（1530），应征入伍。嘉靖十三年（1534），在一次抵御蒙古入侵的战争中，痛失左目，医治好后，继续在军中服役。后因被诬欠短粮草，受尽酷刑。戍边的艰苦生活，痛失左目与被诬受刑的身心折磨，遂使李宾宗教情感油然而生。嘉靖十七年（1538），李宾拜传习无为教的周玄云为师，经过近二十年的“明修暗炼”，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悟道成真”，创立了黄天道。罗清、李宾等人，当他们通过救己创教之后，便以所创教派传教收徒，开始其所谓“救人”之“圣业”。

“救人”。民间宗教的“救人”分为精神上、心理上的抚慰和物质上、生理上的救助两个方面。

民间宗教在精神上、心理上“救人”时，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劝导下层民众念经诵咒。所谓念经，就是念诵各自教派编写的“宝卷”。在大部分教派编写的“宝卷”中，其“开经偈”都有念诵“宝卷”，可以祈福禳灾的偈语。如《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开经偈》：“收圆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萨降临来；大众志心齐声和，现在增福又消灾。”这就是说，下层民众只有经常念诵宝卷，做到心灵与神灵相通，才能“诸佛菩萨降临来”，收到“增福又消灾”之功效。民间宗教常用的咒语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认为念诵八字真言，就是向无生老母发出一种求救信号，可以得到无生老母的救助，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民间宗教又认为，福祸是与善恶相感应的，下层民众念经诵咒就是为了明晓这个道理。因此，要想来世享福，就得今世修善。如种善因，就得善果，升入天堂，永享富贵；若种恶因，就得恶果，转入地狱，永受折磨。为此，民间宗教担负起道德救赎的重任，鼓励下层民众去当善男信女，把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消融在祈祷“云城降世”的追求中，这对于深受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奴役的广大民众来说，无疑具有精神解脱、心理抚慰作用，从而给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安全温馨的精神家园和信仰归宿。此外，民间宗教还通过举办各种仪式，让广大信众随着仪式的逐步展开，在神圣时间——举办仪式的日期，神圣空间——举行仪式的场所，感受震慑魂魄的信仰力量，使心理达到平衡，精神获得解脱。

民间宗教在物质上、生理上“救人”时，主要采取三个手段：

一是直接以食物救助。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在天师道政权管辖内，设立“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宋代明教提倡互助互用，“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不必相识，党人皆馆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①。明季无为教在运河要道建立了数十座庵堂，“粮船来南，多以米粮资其食用，或粮船水手有疾病流落者，各庵之人，亦资其盘费”^②。清中叶收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践行“有患相救，有难相死”的互助精神，凡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你我”。福建欧宁吴建、吴昌兄弟倡行白莲教，宣传人无私产，号召入教者尽变卖私产。清中叶天理教对于“有告贷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

^① 《宋会要辑稿》第一六五册《刑法二·禁约》。

^② 《朱批奏折》，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江苏巡抚陈时夏奏折。

家”^①。清末黄崖教在山东肥城境内的黄崖山建立了一个财产公有、教养兼施、君师合一、士农商兵相结合的村社式的“理想王国”，来归者达两千家，人数累万。至于雄踞江南半壁河山的上帝教，力图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太平世界，更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

二是为缺医少药的广大民众无偿医治。明末以来，弘阳教在民间行医，为人治病，并向民众施药、舍粥。清代在理教定时向寡妇发放救济款物，又对贫民死亡施舍棺匣；真空道以帮助人们戒食鸦片为其主要宗教活动，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赞誉。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卍字会更是在全国各地兴办了众多医院、施诊所药处所，在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民国社会，为解决广大民众的疾病问题作出了贡献。特别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日本侵略者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后，世界红卍字会第一个赶赴现场，救助难民、掩埋尸体，向世人彰显了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三是传授信众坐功运气，习练拳棒。明末以来，三一教传授“九序心法”，使习练者能够收到却病延年之功效。清代天地门教向信众“派功”，使信众在焚香磕头的过程中，心灵得到净化，身体得到锻炼；而义和拳教有文场、武场之分，文场坐功运气，武场习练拳棒，无论是坐功运气，还是习练拳棒，都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雍正、乾隆时期，京城一带的弘阳教也传授“静养工夫，教人右手扣着左手，右脚扣着左脚，舌头抵着上牙根，可以疗疾延年”^②。

“救世”。一切宗教组织的世俗精神，都是以爱、向善为核心而体现它的凝聚力量和社会功能，并由此燃起救世之火。^③当然，民间宗教也不例外。民间宗教“救世”的途径有二，一是对现实世界采取“批判的武器”，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与残暴；二是对现实世界采取“武器的批判”，策动、组织、领导下层民众举行暴动、起义。

在民间宗教看来，现实世界处于三期末劫，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对此，民间宗教常用谶语形式，予以揭露和批判。如清乾隆年间，云贵地区流传一种揭帖，假托天师预言，宣扬三期末劫来临，人民“十愁”：“一愁天下多兵马，二愁夫妇不到头，三愁有屋无人住，四愁饿死满山头，五愁身中发冷死，六愁老少东西流，七愁兵马多疾病，八愁月下虎狼多，九愁水满山崩透，十愁有路无人行。”^④嘉庆二十年（1815），山西临晋、虞乡等县，也出现了一种将灾难概括为“十愁”的揭帖。它亦假托天师预言，时逢三劫，人民不安，世人难免十愁：“一愁畜安人不安，二愁山东归平川，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云南民遭难，六愁民人死一半，七愁有饭无人吃，八愁有衣无人穿，九愁有路无人走，十愁难过鼠牛年。有人闯过此二年，便是长生不老仙。”^⑤这些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的谶语，曲折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兵灾凶荒”的不平和叹息。

但是，当下层民众面临“造反死，不造反也死”的生死抉择时，民间宗教往往乘势以神佛的名义，召唤下层民众拿起武器，举行暴动、起义。纵观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民众起义，

① 兰簃外史：《靖逆记》第五卷《林清》，上海书店，1987年。

② 《清高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九，乾隆十一年六月癸未。

③ 麻天祥：《中国宗教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90页。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云贵总督爱必达奏折，并附照抄黎调元等谣帖。

⑤ 梁景之：《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

大多与民间宗教的策动、组织乃至领导有关。从东汉末年太平道领导的黄巾大起义，到元朝末年白莲教组织的红巾军大起义；从明朝初年唐赛儿领导的山东白莲教起义，到明中叶白莲教组织的荆襄民众起义；从明末东大乘教策动的山东、北直徐鸿儒、于弘志起义，到清中叶清水教领导的山东民众起义；从历时九年的川、楚、陕收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起义，到天理教攻打紫禁城的壮举；从清末上帝教领导的试图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拳运动，乃至民国时期反抗北洋军阀暴政的红枪会运动，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民间宗教策动、组织、领导的这些民众暴动、民众起义，封建统治者绝不手软，常常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凶残，不遗余力地剿杀与镇压。

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徒被斩首者达十万余人。唐赛儿起义失败后，四千名教徒被擒，均被斩杀。荆襄流民起义失败后，先是白莲教首领刘通等四十人被磔于京师，参加起义教徒，男子十一岁以上者，均被斩杀；接着，白莲教另一首领石龙等七十三人被磔于市，并斩其家属五十二人；最后，石龙部将李原也战败被俘。“兵刃之加，无分玉石；驱迫不前，即草薶之，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贵充军者，舟行多疫死，弃之江浒，臭不可闻，怨毒之气，上冲于天。”^① 东大乘教起义失败后，磔斩起义领袖徐鸿儒等十八名及其父徐东明、母傅氏；于弘志则在保定，被梟首示众。清水教起义失败后，王伦举火自焚，其家属，不分男女老幼，被当局尽行处斩；同族五服亲属，一并迁徙三千里，入籍为民。收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起义期间，清军所到之处，杀人如麻，起义军领袖除战死疆场和少数投降外，凡是被捕者，均凌迟处死。天理教失败后，攻入紫禁城的大部分教徒被斩杀，林清被凌迟处死。李文成战败后，举火自焚，其祖坟莹被清军掘焚；其他首领被生擒，押解京师，凌迟处死，共有两万多名信徒被杀，两千多名信徒被擒，如此等等。

这就是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一部以千百万民间宗教信众鲜血浸红的下层民众信仰生活史。封建统治者对民间宗教教首或起义领袖，动辄就处以凌迟极刑，其凶狠程度，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民间宗教信仰现象，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独特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时至今日，每当人们阅读这段血腥史，都会在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同时，诅咒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残暴与毫无人性。

四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以政治标准衡量一切，又热衷以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替代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② 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应该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时恪守作为“学术灵魂”的独立而客观的理性批判精神，^③ 首先

^① 《明宪宗实录》卷九十八，成化七年十一月己未。

^② 刘放桐：《〈杜威全集〉中文版序言》，《哲学分析》2011年第1期。

^③ 张志刚：《宗教哲学研究——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摒弃民间宗教是不是一种宗教这个本来不应置喙的伪问题，确立民间宗教不等于“邪教”的科学理念，绝不能再像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那样，将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一概而论归为“邪教”，更不能将现实社会中广大民众信仰的民间宗教视为“异端”。其次，我们应该真正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的民间宗教活动，进行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实事求是^①的而不是随意妄断的审视与评价。

翻开近两千年的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流行于民间社会的各种教派，既有以推翻封建王朝为职志的教派，也有以传教敛钱为目的的教派，同时，还有既为广大民众解脱精神痛苦，又为广大民众解决疾病折磨的教派。经过大浪淘沙和下层民众的不断选择，真正能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教派，大多是那些以“劝人为善行好”，为广大民众解除精神痛苦和疾病折磨的教派，如明代的弘阳教、三一教，清代的在理教、天地门教等教派，而正是这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教派，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朴素、最率真、最真实的伦理道德、人生价值和理想追求，闪烁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草根精神。在目前人们普遍存在精神贫瘠和信仰危机的情况下，不妨借用儒家“礼失求诸野”^②的文化开放精神，从都市走向乡村，从“精英”转向群众，从“理论”面向实际，到千百万人民群众那里找回人类最本色、最简单、最质朴的“知行合一”的做人处世准则，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当然，让宗教在今天的文化建设和精神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或主导作用已不可能。不过，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唱好“主旋律”的前提下，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和民间宗教——在当代中国仍可积极参与社会和谐、多元文化共存的“大合唱”，^③并为凝聚中国力量，发扬“中国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作出贡献。

与任何宗教一样，民间宗教同样具有两重性，在中国历史上与中国现实社会中，民间宗教既发挥过建构作用，也发挥过解构作用；既提供过正值的社会资本，也提供过负值的社会资本。民间宗教的解构作用和负值的社会资本，留给人们记忆最深的便是中国历史上一些教派首领由传教敛钱而富甲一方，继而问鼎政治，觊觎神器，为实现政治野心，不惜铤而走险，如明末清初的东大乘教王氏家族、清初的八卦教刘氏家族等。明清时期民间宗教运动中出现的这些“神圣家族”，可以为今天提供一面识别那些企图以宗教达到个人目、实现个人野心的镜子。从这一点来说，这些民间宗教运动的异化物，还是颇有借鉴意义的。此外，在民间宗教一些教派中盛行的扶乩、走阴、按体、幻术、星相、术数等迷信活动，低俗诡异，骗钱害

^① 自公元前2世纪西汉河间王刘辟疆提倡治学必须“实事求是”以来，这四个字便成为中国人判断做人做事是否真假的理想标准。不过，说起来容易，真正实行起来，必须要有心底无私的崇高境界和为坚持真理敢于献身的牺牲精神。

^②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观万方之略矣。”

^③ 卓新平：《从“文化强国战略”看中国传统文化及宗教的意义》，《中国宗教》2011年第12期。

人，既污染了社会生态环境，又使许多信众上当受骗，其负面、消极的社会功能，自不待言。尽管如此，这些教派唯利是图，缺乏理性的信仰，并不是民间宗教的主流，更不是民间宗教的全部。

其实，民间宗教发挥的解构作用也好，提供的负值的社会资本也罢，都不是它的本质属性，因为“宗教本身既无本质也无王国”^①，均是社会问题在民间宗教当中的反映。因此，我们在关注民间宗教问题时，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特别关注整个社会问题，“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②。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间宗教既是“过去时”，又是“现在进行时”，更是“将来时”的一种宗教信仰现象。只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③这一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民间宗教就会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大宗教一样，将会长期存在，并会因为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继续发挥着或是建构作用，或是解构作用；或是提供正值的社会资本，或是提供负值的社会资本。对此，我们应有清醒认识和战略眼光。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④ 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世界形势下，如何正确对待遍布全国乡村社会的民间宗教复兴重建活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对此，如何按照马克思关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⑤的方法论原则，谋划出一套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正在考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智慧。^⑥

五

最早对中国民间宗教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始于荷兰汉学家格鲁特（De Groot, J. J., 1854—1927）。其所著《中国的教派宗教与宗教迫害》（*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a page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完成于1903年，对盛行于明清时期的龙华教、先天教仪式活动进行了初步考察。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也涉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领域，如1923年，陈垣先生发表的《摩尼教入中国考》，论及摩尼教遭到镇压后，出现民间化、秘密化倾向；

① 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②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③ 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而将来当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的时候，也就是“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⑥ 濮文起：《中国民间宗教试论》，《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1期；濮文起：《从“离异”到“归属”——正确看待民间宗教的合法性诉求》，《中国民族报》2013年4月2日。

1935年，孟森先生发表的《满洲老档译件论证之一》，谈及清初东大乘教支派善友会活动；同年，陶希圣先生发表了《元代白莲弥勒教会的暴动》和《明代白莲弥勒教及其他妖贼》，叙述了白莲教在元明两代的造反事迹；1936年，魏建猷先生发表的《八卦教残余经典述略》；1937年，吴之瑛先生发表的《圆教始末及其经典》，均阐释了民间宗教经卷；而吴晗先生在1940年发表的《明教与大明帝国》，则系统地解析了明教与朱明王朝的思想渊源。

李世瑜先生是中国第一位以人类学方法对中国民间宗教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1947年，他在辅仁大学比利时籍教授贺登崧的指导下，对黄天道的发祥地河北省万全县进行了田野调查。此后，他又以同样方法，调查了一贯道、皈一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写成硕士论文《现在华北秘密宗教》，1948年，由四川大学史学系出版。该部著作的问世，对后世中外治此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的民间宗教学术研究是一个政治敏感区，无人敢于涉足问津。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世界宗教学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中国民间宗教学术研究成果，一直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代表人物有平山周、重松俊章、铃木中正、吉冈义丰、泽田瑞穗、洼德忠、酒井忠夫、塚本善隆、野口铁郎、浅井纪、武内房司等先生。其次，中国台湾学者的中国民间宗教学术研究成果，也令学界刮目相看，代表专家有李亦园、戴玄之、庄吉发、王尔敏、辜海澄、宋光宇、林万传等先生。^① 他们的研究成果，资料翔实，新见迭出，对民间宗教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期间，西方学者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②、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丁荷生（Dean Kenneth）^③、乔大卫（Jordan David David）^④、理查德·荣格（Jung, Richard L, K）^⑤、高士达（Blaine C, Gaustad）^⑥、塞西里·麦克卡弗雷（Cecily M. McCaffrey）^⑦、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⑧、刘广京（Kwang-ching Liu）^⑨、石汉椿（Richard Shek）^⑩ 等教授的研究成果，亦令学界瞩目。^⑪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党中央一系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举措的落实，特别是随着

① 参见本辞典附录三《中国民间宗教论著、资料目录》。

② 韩书瑞教授、欧大年教授、王斯福教授著作，已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参见本辞典附录三《中国民间宗教论著、资料目录》。

③ 丁荷生（Dean Kenneth）著有《华南的道教科仪和民间教派》、《东南地区三一教研究》。

④ 乔大卫（Jordan David）与欧大年合著《飞鸾：台湾中国宗教教派的诸相》。

⑤ 理查德·荣格（Jung, Richard L, K）著有《乾隆皇帝平叛：镇压白莲教和天理教的战争，1774—1788》。

⑥ 高士达（Blaine C, Gaustad）著有《清朝中期的异端宗教和国家：白莲教起义的背景研究，1796—1804》。

⑦ 塞西里·麦克卡弗雷（Cecily M. McCaffrey）著有《经历叛乱：中国湖北白莲教起义的地方史》。

⑧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有《教徒和战士：白莲教对捻军起义的影响》。

⑨ 刘广京（Kwang-ching Liu）著有《1796年湖北白莲教起义时的宗教与政治》。

⑩ 石汉椿（Richard Shek）著有《1891年热河在理教、金丹教起事》、《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正统与异端》、《伦理与政治：佛教异端、弥勒信仰与早期白莲教》。

⑪ 刘平、冯彦杰：《近年美国有关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5期。

党和政府率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国策的逐步推进，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一样，宗教学研究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研究模式转变为“以学术研究为准则”的研究模式，从而使宗教研究中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有了新的阐释，并在该领域有了自己的建树。^①作为宗教学分支学科的民间宗教研究，亦从过去的“险学”变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显学”，并呈现较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极清晰的学术转向。

1991年，笔者撰写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民间宗教的专著，具有民间宗教简史性质。^②1992年，马西沙与韩秉方两位研究员合作撰写的《中国民间宗教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如果说李世瑜先生的《现在华北秘密宗教》是中国民间宗教学术研究史上第一座里程碑的话，那么，马西沙、韩秉方两位研究员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则是第二座里程碑，且是一座更具学术价值和宗教学意义的里程碑。

此后，蔡少卿教授、秦宝琦教授培养的一批博士，相继投入民间宗教研究领域，无论是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是出版的学术专著，其数量与质量都被学界看重，如刘平、宋军、周建超、郑永华、梁家贵、孟超、赵志等博士，^③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马西沙研究员培养的博士也是研究成果斐然，如梁景之、陈进国、李志鸿等博士，^④均为学术新锐。蔡少卿、秦宝琦、马西沙三位先生在培养博士的过程中，还分别撰写了多部民间宗教学术研究成果。^⑤

福建师范大学林国平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就深入福建莆田、仙游一带调查三一教，其研究著作《林兆恩与三一教》，199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部研究三一教的专著。王熙远教授亦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深入桂西高山汉族地区，调查活动在当地的普度道、魔公教，其研究成果《桂西民间秘密宗教》，199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称赞。路遥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始，在其学生孔祥涛等人的协助下，走遍齐鲁大地的乡村城镇，调查曾在这方土地活动的民间宗教，其最终成果《山东民间秘密教门》，2000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后，被学界誉为“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中国民间教门田野调查”^⑥。此外，杨讷、赫治清、程献、李富华、冯佐哲、连立昌、李尚英、邵雍、陆仲伟、金泽等教授，都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民间宗教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继出版了一部乃至多部著作。^⑦

关于民间宗教“宝卷”等经卷搜集、整理和研究，有大陆学者濮文起、宋军、车锡伦和台湾学者王见川、林万传、李世伟、范纯武先后整理出版的《宝卷初集》（40册）、《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12册）、《民间宝卷》（20册）、《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续编》（12册）；^⑧

① 徐以华：《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趋势与研究》，卓新平主编《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② 1996年，台湾南天书局出版繁体字版。

③④⑤⑦ 参见本辞典附录三《中国民间宗教论著、资料目录》。

⑥ 程献、曹新宇：《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中国民间教门田野调查——评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⑧ 参见本辞典附录四《宝卷、经卷目录》。

“宝卷”研究专著有喻松青研究员著《民间秘密宗教经卷研究》、李世瑜先生著《宝卷论集》、车锡伦教授著《中国宝卷研究论集》；^①“宝卷”目录则有车锡伦教授编《中国宝卷总目》。^②

在民间宗教资料搜集与建设方面，赵嘉珠先生组织力量，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版的方志中的“会道门”资料辑录起来，编成《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刘子扬、黎青先生选编的《清代秘密结社档案辑印》，由北京言实出版社出版；2006年，刘子扬、张莉先生选编的《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这三部大型民间宗教历史文献资料书，连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谢国楨、杨讷、蒋维明、王永兴、陈高华、朱国烺、刘炎等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选编的隋、元、明、清诸朝代民间宗教史料，^③为国内外民间宗教学者从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对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早期摩尼教和宋元以来明教研究，林悟殊教授可称其中翘楚。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悟殊教授相继出版了《古代摩尼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中古三夷教辩证》（中华书局，2005年）。此外，荣新江教授著《中古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马小鹤教授著《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芮传明教授著《东方摩尼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均为多年精心研究之作。

我国台湾、香港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民间宗教研究论文和专著。在这些学术论著中，除上面介绍的那些老专家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像20世纪80年代以后崭露头角的郑志明、王见川、李世伟、游子安等学者的不少学术佳作。^④

中国民间宗教学术研究引起了其他人文学科的关注。其中，一些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从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关系的视角，阐述了民间宗教与古代小说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代表作有万晴川教授著《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及帮会之关系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同时，也引起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兴致。他们深入乡村，开展田野调查，通过对广大民众宗教信仰的研究，倾听到了来自普通百姓的声音，复原了往昔生活的丰富图景。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9月21日至24日，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联合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民族文献研究基地，在甘肃兰州召开了“民间宗教研究：第四届宗教与民族学术论坛”，这是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年会名义，召开的首届以“民间宗教”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反映了民间宗教研究已扩展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教学与研究领域。2012年10月9日《中国民族报》进行了专题报道，认为此次论坛开得非常成功，“虽然对于民间宗教的本质性问题尚存分歧，称谓上也不尽统一，但一致认为，从信众人数上来说，民间宗教在现实中应是中国宗教文化的主体，对社会和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正视其存在，并对其进行适当引导”^⑤。

① 喻松青：《民间秘密宗教经卷研究》，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李世瑜：《宝卷论集》，台湾兰台出版社，2007年；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北学海出版社，2007年。

②③④ 参见本辞典附录三《中国民间宗教论著、资料目录》。

⑤ 答晓群：《“民间宗教研究：第四届宗教与民族学术论坛”综述》，《中国民族报》2012年10月9日。

随着民间宗教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中国大陆部分高等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招收攻读民间宗教学科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建立了民间宗教研究博士后站，招收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青年博士进行深造。他们高质量的论文，^① 向世人昭示了民间宗教研究队伍后继有人，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每年都有青年学者获准立项，^② 反映了国家对民间宗教研究的重视和对青年学者寄予的厚望。因此可以说，如今的中国民间宗教学术研究的薪火相传，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于是，建立一个“中国学派”的“民间宗教学”，便成为老中青三代学者下一步共同努力的奋斗目标和真诚祈盼的学术愿景。

六

2006年，当笔者主编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已满十年合同期限之际，就计划在汲取1996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部辞典进行修改、增订，编纂一部客观求实、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能给专家学者提供研究方便的大型工具书。经过十几年的不断积累和不懈努力，现已告竣。

与《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不同，本辞典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移录了大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现的民间宗教新资料。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学术观点：“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③ 遵循陈寅恪倡导的这种学术原则和治学精神，本辞典对所引资料，如是少见、罕见，且篇幅不长，便径直引介，以便研究者直接使用。

关于“民间宗教”概念，自20世纪以来，相继出现了“秘密宗教”、“民间秘密宗教”、“秘密教门”、“秘密道门”、“民间秘密宗教结社”、“民间宗教”、“民间教派”、“封建会道门”、“反动会道门”，甚至“邪教”诸种概念。如任继愈先生认为：“所谓民间宗教，相对于正统宗教而言，它不为统治阶级所承认，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被当局称为‘邪教’或‘匪类’。”^④ 赵世瑜教授则认为，所谓民间宗教，指的是不被官方认可的、由民众组织和参与的宗教体系和组织，它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自己的教义，在思想内容上与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有一

^①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知网”登录的博士论文20多篇，硕士论文60多篇，研究的内容涉及民间宗教思想，民间宗教领袖人物，民间宗教教派罗教、金幢教、一贯道，清代民间宗教，民国时期世界红卍字会、在理教、万国道德会，宝卷与文学，江西、江苏、东北、安徽、台湾等地区民间宗教，抗日战争时期的民间宗教，国民党、共产党与民间宗教在抗日战争中的关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取缔会道门运动等。其中，有许多新的学术观点和新发掘的资料，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价值。详见“中国知网”。

^② 如2008年度，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时国轻获准立项，其课题名称为《环首都地区新农村建设民间信仰现状的调查与思考》。2010年度，杭州师范大学刘正平获准立项，其课题名称是《江南地区民间宗教调查与研究》。2011年度，莆田学院俞黎媛获准立项，其课题名称是《闽台民间宗教信仰的生态学研究》。2012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志鸿获准立项，其课题名称是《闽西罗祖教调查研究》；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朱钧获准立项，其课题名称是《明代无生老母信仰研究》。

^③ 转引自史金波《创建黑水城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里程碑》，《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

^④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75页。

定的联系，可是往往被官方视为危险的邪教和异端。^① 2012年春，牟钟鉴教授又提出“民间组织化宗教”概念，用以指称民间宗教。^② 笔者直到2000年，仍在使用“民间秘密宗教”概念，撰文写书。^③ 步入21世纪以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逐渐发觉，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的众多教派，有的教派创建时，是秘密活动的，随后，便公开活动，不久，又进入秘密状态；有的教派创建时，是公开活动的，随后，便转入地下；有的教派自始至终就公开活动，还有的教派自始至终就秘密活动。因此，笔者赞同马西沙研究员的说法，即使用“民间宗教”这一概念，“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④，也更符合历史实际。在这种认知的支配下，笔者在最近十几年的研究成果中，均使用“民间宗教”概念，阐述民间宗教的人和事、思想和功能、作用和影响等。故此，在本辞典杀青付梓之际，便将其冠名为《新编中国民间宗教辞典》。

是为序。

甲午仲春
于活水大化斋

①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第13页。

② 牟钟鉴：《宗教生态论》，《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

③ 我在所著《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导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开篇即说：“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又称民间宗教、秘密宗教，亦称教门、道门等，它是作为正统宗教如佛教、道教的异端，为下层民众所崇奉，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各种教派。”

④ 马西沙：《中国民间宗教简史·绪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